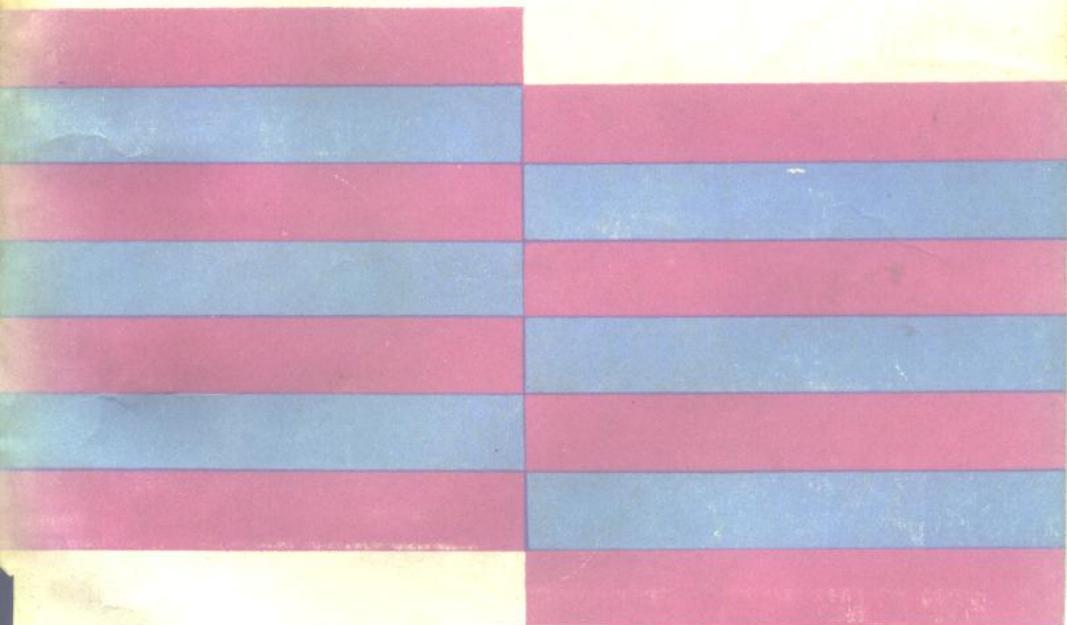


美国教育基础

——社会展望

[美]理查德·D·范斯科德 理查德·J·克拉夫特
约翰·D·哈斯 合著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 译

美国教育基础 ——社会展望

[美]理查德·D·范斯科德
理查德·J·克拉夫特 合著
约 翰 ·D·哈斯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期 限 表

请于下列日期前将书还回

成1105-1

měiguó jiàoyù jíchū

美国教育基础——社会展望

〔美〕理查德·D·范斯科德
理查德·J·克拉夫特
约翰·D·哈斯 合著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环西路1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房山县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4.125 字数 333,000

1984年12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8,400 册

书号：7232·222 定价：2.40元

G571.2
2

0387215

内 容 提 要

本书比较全面地叙述了美国的教育历史、教育思潮、教育体制、教育结构,对美国教育中的阶级限制、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宗教影响等现存问题以及由于社会危机而导致教育危机的发展前景,均有所议论。就这些方面的议论看,有其一定的客观性,可供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特别是从事美国教育研究的参考,也可供高等学校教育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阅读。但本书内容广泛,涉及社会科学众多领域,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和资产阶级政治倾向,所在多有,请各方面读者在阅读参考中随时留意分析、鉴别。

译者说明

本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美国教育。包括美国教育的历史、各种教育思想、教育发展的前景与教育体制、教育结构以及教育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是专为在美国攻读教育学科的研究生撰写的，也可供我国教育工作者阅读参考。

全书共有四篇十四章。其中“教育史”、“教育哲学”与“教育社会学”为蔡振生翻译；“学校教育经济学”为包彩娟翻译；“教育中的价值观”为陈树清翻译；“性别歧视”为王英杰翻译；“种族主义与种族差别”、“学校的组织结构”、“课程”与“全球的幸存者”为李环翻译；“专职教师”由江苏师范学院的蔡煇年翻译；“可选择的学校教育”为蔡郁毓翻译；“教育政治学”与“社会与教育的未来”为赵宝恒翻译。全书由赵宝恒统校。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史研究室段生农同志认真看了全部译稿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我国与美国的国情不同，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亦有很大区别，所以我们在翻译本书时略去了每章最后的“实例研究”、“思考题”与“教育实践”。本书的思想观点、政治倾向方面的问题，希望读者随时注意分析鉴别。

译文中的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

一九八四年六月

中译本序言

本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是世界教育大改革、大发展的时期。这种改革和发展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了，特别是占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许多过去的殖民地纷纷宣告独立，建立起独立的民族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民主运动的高涨，人民大众要求政治民主化，要求受教育的权利。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着各国教育的发展和改革。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方面使几个先进工业国家如德国、日本、法国等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在战争中因军事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以核子、电子为代表的新的科学技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战后三十多年国际间的竞争也表现为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力量的竞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人力资源的开发”被作为高速度发展经济的条件在六十年代提了出来。

再次，由于科学技术在战后的迅猛发展，中小学教育的内容显得陈旧落后，在五十年代就酝酿着教育的改革。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了六十年代教育大改革的直接导火线。苏联卫星上天以后，美国朝野为之震惊。他们组织了以当时哈佛大学校长康南特为首的委员会对美国的教育进行调查，调查报告表示美国的中小学教育质量落后于苏联。为了与苏联争霸，他们

要求进行教育改革。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所谓“国防教育法”，用联邦政府拨款的办法来促进教育的改革。改革的中心内容是实现教育的现代化。这次教育改革影响到世界各国。

六十年代被人们称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好景不长，自1973年开始，由于石油危机引起的经济危机波及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次危机，一反常态，久久不能复苏，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长期受到生产过剩危机、货币危机和国际收支危机的严重威胁，使得生产停滞，失业增加，通货不断膨胀。经济危机迅速地反映到这些国家的教育上，因而产生了教育危机。这一教育危机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毕业生过剩，就业困难，失业人口增多。“毕业即失业”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

（2）教育质量下降，青少年犯罪率增加。美国全国教育质量委员会经过十八个月的广泛调查后，给美国全体公民写了一封题为“处境危险的国家：迫切需要进行教育改革”的公开信。信中说：“我国社会的教育基础正在削弱，这是因为平庸之才越来越多的缘故，这种现象将对国家和人民的未来构成威胁。”

（3）教育经费的增长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学生来源短缺，学校经费困难，迫使许多私立大学关闭。据美国联邦政府统计中心统计，近十年来已有一百多所高等学校停办，有人估计，这种趋势在八十年代还将加剧。

（4）经济危机带来的失业和教育质量下降，使人们对教育失去了信心。纳税人不愿意再增加教育经费，因为看不到它的经济效果；青年人感到没有出路，存在着一种危机感，对教育的价值观发生了怀疑。

因此，如何摆脱教育危机，提高教育质量，是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是世界教育大改

革、大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大动荡的时期，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教育理论和思潮。

美国理查德·D·范斯科特、理查德·J·克拉夫特和约翰·D·哈斯合著的《美国教育基础——社会展望》一书，出版在1979年，是近年来出版的一本比较全面论述美国教育的专著。书的内容主要是介绍美国的教育，但反映了六十年代以来世界教育发展的总的趋势。

全书分四篇十四章：第一篇“美国教育的基础”，分别从教育史、教育哲学、学校教育经济学和教育社会学等几个方面论述美国教育的社会基础。

第二篇“多元化社会中的教育”，分析了美国社会和教育中的重大的社会问题，包括教育的价值观、宗教与教育、种族主义问题和性别歧视问题等。

第三篇“教育制度和教师”，分析了美国的教育制度，主要是中小学校的组织、课程，教师的职业和责任等问题。

第四篇“变通的、全球的和未来的教育”，论述了七十年代初以来替代传统教育的各种学校，考查了其他国家的教育及美国教育的影响，预测教育发展的未来。

作者公开声称自己持温和的改造主义的教育哲学观点。但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引用的西奥多·布拉梅尔德(Theodore Brameld)的话：“改造主义是一种危机哲学，适用于处在危机中的文化和社会，而危机则是民主社会的本质。”所以这本书也确实反映了美国的社会危机和教育危机。同时作者又认为，教育可以解决这个危机，他引用改造主义的观点说：“学校应该成为变革和社会改革的代理人”，“教育的任务是根据社会改良的目的和计划领导社会去实现其价值标准”。作者认为，学校需要根本的改组，以培养学生分析批判的思考力，使学校成为一种社会变革的力

量。作者站在唯心主义哲学的立场上，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本质和根源，当然也找不出解决危机的出路。作者承认教育是从属于政治的。说“教育事业不问政治与超党派”的说法“不过是一种由于人们的短见和沉默而变得永恒的神话”，并且用具体实例分析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这一点，不能不说这是作者的高明处。然而他又期望用学校来改造社会。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当然是不可能的。这是作者自相矛盾的地方。

应当说，虽然作者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看待美国的社会和教育，但是他在许多问题上作了客观的描述，例如关于美国教育中的阶级差别、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以及教育与宗教的关系等等，作者都较客观地反映了美国教育的现状，揭露了某些问题。并且可以看出，作者所持的态度也还是比较民主的。他反对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反对学校里进行宗教教育等。

这本书是供学习教育课程的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用的教科书，它论述了美国教育发展的历史，当前美国教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内容比较广泛，因此，对于我们了解美国教育的发展和问题，当代美国流行的教育思潮以及它们的社会历史背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我们阅读的时候一定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加以分析和批判，才能从它所阐述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中把握住美国教育的本质。

顾明远

1984年3月16日

目 录

第一篇

第一章 教育史——传统的和修正的观点	(1)
第二章 教育哲学——关于教育意义的探索	(40)
第三章 教育政治学——权力与管理	(67)
第四章 学校教育经济学——报偿和自相矛盾	(88)
第五章 教育社会学——学校的社会化	(127)

第二篇

第六章 教育中的价值观——宗教的和世俗的	(159)
第七章 种族主义与种族差别——承认差异	(195)
第八章 性别歧视——认为女人是糖、是调味品、 是嘲弄的对象	(232)

第三篇

第九章 学校的组织结构——教育体制的结构	(269)
第十章 课程——教育体制的结构	(298)
第十一章 专职教师——任务与职责	(324)

第四篇

第十二章 可选择的学校教育	(351)
第十三章 全球的幸存者——教育的问题和模式	(383)
第十四章 社会与教育的未来	(415)

第一篇

第一章 教育史

——传统的和修正的观点

向所有人开放的教育机会均等的理想，导致了下自早期教育，上至中等和高等教育单一的和免费的公共教育体系的发展。再者，为了使每个人成为一个好公民，从而提出了强迫教育的要求，因为基于社会的和个人自身的福利，就不能听任文盲和未受教育者的个人兴致随心所欲，免费的学校教育并不是美国所特有的，但从最低到最高水平教育机会均等的思想，在别的地方都没有如此明显地被表述出来。或如此有效地予以实现^{〔1〕}。

美国公立学校教育的设计师们曾有一个大胆的关于教育新实验的想象。公立学校是用以传播年轻共和国的价值标准的论坛；它也是动员各种根本不同的社会文化团体成为政治上紧密地聚合在一起的统一体的机构。公共教育预定要完成美国社会在促进机会均等、社会流动* 和经济公平方面平等主义的目标。

〔1〕 R·弗里曼·巴茨 (R. Freeman Butts) 和劳伦斯·A·克雷明 (Lawrence A. Cremin)：《美国文化中的教育史》（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963年），第564—565页。

* 社会流动 (Social mobility)，指一种社会地位向另一种社会地位的运动。社会流动分垂直流动，即社会阶级、地位和权力等级上下之间的流动和水平流动，即社会不同职业横向之间的流动；又分集体流动和个人流动。——译者注

实现这些目标的路程并不总是平坦的，路途中连续的步骤也不总是清楚的。事实上，直到今天，有关这些目标的真理性怎样，怎样有力地实行这些目标，这些目标实现到了什么程度，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的。传统的教育观点认为，我们对这些民主目标的探索一直是成功的。修正派的教育观点则对这种探索的真诚性和有效性都提出了责难。

对美国教育史的探究需要通过尽可能多的证据来进行清理，以便帮助弄清这种引起争论的制度的本质。公共教育一直是、而且至今仍然是充满了各种谎言、神话和现实的。

影响美国教育的某些大师^[2]

美国教育思想有着丰富的历史渊源，虽然许多指导原则源自那些先于我们文化的思想家们的思想。在这些教育思想“大师”中，有些是近代的欧洲人；其他人则是古代的经过时间考验的人，但是其中极少数人现在已和我们没有什么关联了。

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先行者

古希腊文化和教育的性质表明了广泛不同的价值系统。城邦国家斯巴达的希腊人尚武，其教育系统预定要增强这种尚武势态的。斯巴达的教育是在损害智力发展的情况下培养体力和耐力、忠诚、庄严和服从的。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雅典人强调智育和美育，用体育、竞技和运动来补充历史、哲学、戏剧、修辞、

[2] 我们从阿道夫·E·迈耶 (Adolphe E. Meyer) 的《教育思想的大师》一书书名中借用了“大师” (grandmaster) 一词 (纽约：麦克米伦—霍尔图书公司，1975年)，第51—52页。

科学和音乐的基础教育。

在雅典出现的新精神，给西方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学和教育思想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在这个时代以前，个人自由一直是被压抑的，社会主要是静态的。在雅典文化中，个人自由、首创精神和发展机会得到促进。结果，使希腊人趋向于成为富于想象、爱好艺术和有创造力的人民。他们也是好奇的、有逻辑头脑的、对事物抱怀疑和批判态度的人民，正如探索精神会给科学以最初推动所显示的那样。因此，西方世界最早的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而且通常既是哲学家又是教育家，都来自雅典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苏格拉底（Socrates 公元前469—399年）没有留下遗著，但是通过他的学生、朋友和批评者的著作，人们了解了关于他的许多事情。尽管苏格拉底是一位目光敏锐的、好争论的、甚至是煽动性的人物，但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正直人。正如大多数雅典人一样，他是一个运动员，必要时也会成为一个士兵，但他主要是哲学家、批评家和教师。他最终因他的使人不安的学说被处死，而不是在先他曾拒绝接受的被流放。苏格拉底所珍视的不是言语的漂亮、诡辩学派教育家居高临下的教学风格，相反的是思想的力量和对经验的分析。在苏格拉底看来，真理是所有能思考的人都同意的那种知识。这种得出真理的方法，不仅使他最终被杀，而且也使他英名不朽。这种方法是怀疑论、诘问、演绎逻辑和辩证方法的结合，他以无与伦比的高超技能运用这种方法来探索某一观念、信念或问题的核心。这种辩证方法一向被称为苏格拉底问答法（Socratic Method）。

虽然柏拉图（Plato 公元前427—347年）是苏格拉底的学生、门徒，又同是雅典人，但是他在许多方面与他的导师迥然不同。苏格拉底的清秀大方并不著称（事实上他是一个朴质的人），而柏拉图则肩膀宽大、有吸引力和体格非常健美。更重要的是，

柏拉图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发现每个人的天然资质，发展其才能，并使其和谐地适应所处的社会阶级制度。每一个人最适合的社会公职是由挑选、筛选和检验来决定的。柏拉图最终认为，每一个人的才能必须很好地加以培育来为社会服务。一种完善的教育应使人发挥风雅和审美能力，从而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引起有用的行为、合理的行为。

另一位雅典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 384—322年)象柏拉图一样认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人的最好品质，这样他们就可能去创造公正的社会。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种本质上是哲学的方法恰成对照，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方法则是客观的、以经验为基础的和归纳的。他给教育方法引进了科学思想和方法论的基本原理。

最早论述教育实践的罗马著作家是马库斯·费比尤斯·昆体良 (Marcus Fabius Quintilian 公元一世纪)。昆体良留下的遗产在当代教育思想的基本原理中一直是根深蒂固的。昆体良谴责使用体罚，强调必须使学习有吸引力。他还强调家庭生活在儿童早期教育中的重要性，了解学习者的个别差异的必要性，以及游戏和娱乐作为学习的刺激因素的价值。最后，他认识到不仅从书本而且在普通经验中也同样发生教育作用⁽³⁾。

近代欧洲思想

法国的让·雅克·卢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年)、瑞士教育家约翰·裴斯泰洛齐 (Johann Pestalozzi 1746—1827年) 和德国的弗里德里克·福禄培尔 (Friedrich Froebel 1782—1852年) 这三位欧洲教育家，奠定了

(3) 同注(2)，第51—52页。

近代称之为以儿童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的、自然主义的非正规教育的基础。对这三位学者和教育家来说，教育不是生活的准备，而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学习不是劳动的同义语，游戏对学习来说是有价值的。

卢梭是一位哲学家，后来对年轻人的学校教育感兴趣。卢梭在他著名的至今仍为人们所爱读的论著《爱弥儿》中，阐明了教育如何必须出自于儿童的天然兴趣和好奇心，而且必须包括对事物和活动的现实世界的直接体验。卢梭再度肯定了为早先希腊人所强调的体力活动的重要性，并且要求进行有关工业教育、音乐、绘画、写作以及后来为进步派所推广的其他有目的的活动的教学。

随着十分出色的小说《林哈德和葛笃德》的出版，裴斯泰洛齐清楚地表明了将在《葛笃德怎样教育自己的孩子》一书中所遵循的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教育情趣。在裴斯泰洛齐的方法中，对年轻的学习者的爱、感情移入和耐心是与使用实物和感官的知觉相结合的。福禄培尔虽然因为他在教育著作上的贡献而闻名于世，但人们主要因为他首创幼儿园而铭记着他。他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有指导的自我活动，强调协作、自发性行为、创造性才能和乐趣，求得年轻人的社会的和个人的发展。

还有其他一些欧洲学者，他们对新近美国人以某种形式所继承的那种教育的性质有过重要的影响；约翰·弗里德里克·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1776—1841年）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与其他那三位教育家不一样，不能把赫尔巴特指责为一个质憨的浪漫主义者，因为他把所看到的学习者的世界作为最具体的形式去对待，并且试图解剖它和理解它的意义。其结果是他第一个有系统地编制了学习心理学，并由此产生出教学论。赫尔巴特的教育心理学强调通过被称之为“统觉”的联想进行学习。正如他的继承者所发展的，这种教育心理学提出了以下连续

性的教学结构：（1）预备——把学生置于一种接受的情绪中；（2）提示——揭示新教材或新思想；（3）联想——把新材料与旧材料联系起来；（4）总括——以一般的思想、法则或原则的形式发展或综合新的理解；（5）应用——把新思想付诸练习，或检验这些新思想。

殖民地时代美国对年轻人的教育

早在殖民地时代的美国之前，卢梭、裴斯泰洛齐和福禄培尔就已表达和实践了各种教育思想，但是殖民地时代的教育家们对这些观点方法是如何反应的还是个问题。渗入移民们生活中的各种宗教的和社会的信仰与严峻和偏执相一致，更甚于与忍耐和理解相一致。甚至在广为宣传之后，那三位欧洲的人文主义者的恩想仍然没有很快地被美国教育学所接受。

在殖民地时代的学校里，纪律是严峻的，体罚是十分普遍的。至少在这个时期开始时，在一般人眼里儿童都被看作需要用专制和体罚的方式来统治的罪人。《新英格兰初级读本》(New England Primer) 中有一段典型的话说“愚蠢紧紧束缚着儿童的心，但夏楚之威将为儿童驱除愚蠢。”《初级读本》是殖民地时期最出色的教科书，其表面的目的是教会儿童阅读，但事实上其作用广泛得多，特别是在灌输宗教方面。《初级读本》是为许多学生所熟悉的唯一教科书。教学方法几乎没有什想象力，死记和练习是殖民地时代课堂的主要方法。正如劳伦斯·克雷明和默尔·博罗曼(Merle Borrowman)所说的，学生被逐个单独教授已成为一种规则。如果学生做得很好，那就受到赞扬，指定新的作业；如果成绩甚差，惩戒（有时是体罚）和嘲

笑就会随之而来^[4]。今天居支配地位的教学理论，以奖励与否为基础，以不赞许惩罚，这种理论在当时会被认为是天真愚蠢的。

值得庆幸的是，具有毫无把握的有利条件去上早期学校的年轻人是如此之少；其数目可能不超过学龄人口的百分之十。即使某些有影响的殖民主义者把学校看作对社会潜在着非常重大的构成作用，但大多数儿童在学校里只接受有限的教育。许多人从未看到过学校的内含性质，即使在学校接受全部教育的人也看到的很少。通常，上学与不上学的人的区别就是阶级的区别。贫穷的和下等阶级家庭出身的儿童没有正规的学校教育，很早就得学艺谋生。上等阶级的儿童则可接受尽可能得到的教育。在许多情况下直到读完学院（College）为止。此外，殖民地时代的学校规模很小通常是单室校舍，在校期间上课时间比现在要短得多。学校教育在殖民地时代的生活中必然起着有限的作用，但这不应该被看作对殖民地时代儿童和成人教育的不利条件。

家庭和社区，包括商店、工作场所、社会集会、新闻媒介，特别是教堂，是主要的教育机构。这些机构中有一个一旦实际效能遭到削弱时，它就会因新的法律而得到加强，例如那些要求工场主为学徒提供训练的法律；或者发展起另一种机构，例如职业技术训练学校（Training school）或私立的旧制中学（Private academy）。克雷明在他的《美国教育：殖民地时代的经验》一书中认为，殖民地时代的家庭在传递新的有关处理和建立变革的有效的和实用的观念方面，是最灵活最能起作用的教育机构。根据克雷明的估计，不仅经过深思熟虑而建立的教育机构的数目，而且教育的多种多样性，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是这

[4] 劳伦斯·A·克雷明和默尔·L·博罗曼：《我们民主社会的公立学校》（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56年），第64页。